

亚东图书馆足本

三国演义

上

胡适——考证

汪原放——校点

罗贯中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亚东图书馆足本

三国演义

上

胡适——考证

汪原放——校点

罗贯中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亚东图书馆足本/(明)罗贯中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78-3956-3

I. ①三… II. ①罗…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6781 号

书 名	三国演义(亚东图书馆足本)
著 者	罗贯中
责任编辑	樊敏毓
特约编辑	王灵善
装帧设计	李英伟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10-57427866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740 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56-3
定 价	46.00 元(上下册)

《三国志演义》序

胡 适

三国的故事向来是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想像力与兴趣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1)春秋到战国；(2)楚汉之争；(3)三国；(4)南北朝；(5)隋唐之际；(6)五代十国；(7)宋金分立的时期。这七个时代之中，南北朝与南宋都是不同的民族分立的时期，心理上总有一点“华夷”的观念，大家对于“北朝”的史事都不大注意，故南北朝不成演义的小说，而南宋时也只配做那偏于“攘夷”的小说（如《说岳》）。其余五个分立的时期都是演义小说的好题目。分立的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添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所以《东周列国志》、《七国志》、《楚汉春秋》、《三国志》、《隋唐演义》、《五代史平话》、《残唐五代》等书的风行，远胜于《两汉演义》、《两晋演义》等书。但这五个分立时期之中，春秋战国的时代太古了，材料太少；况且头绪太纷繁，不容易做的满意。楚汉与隋唐又太短了，若不靠想像力来添材料，也不能做成热闹的故事。五代十国头绪也太繁，况且人才并不高明，故关于这个时代的小说都不能做好。只有三国时代，魏、蜀、吴的人才都可算是势均力敌的。陈寿、裴松之保存的材料也很不少；况且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了许多杂书的材料，很有小说的趣味。因此，这个时代遂成了演义家的绝好题目了。

《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唐朝已有说三国故事的了。段成式《酉阳杂俎》说：“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剧，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徧鹊字，上声。”又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都可证晚唐已有说三国的。宋朝“说话”的风气更发达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晚年的“说话”共有许多科，内中“说三分”是一种独立科目，不属于“讲史”一科，竟成了一种专科了。苏轼《志林》说：

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

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宋金分立的时代，南方的平话，北方的院本，都有这一类的历史故事。现在可考见的，只有金院本中的《襄阳会》。到了元朝，我们的材料便多了。《录鬼簿》与《涵虚子》记的杂剧名目中，至少有下列各种是演三国故事的：

王晔 《卧龙岗》。

朱凯 《黄鹤楼》。

王实甫 《陆绩怀桔》，《曹子建七步成章》。

关汉卿 《管宁割席》，《单刀会》。

尚仲贤 《诸葛论功》（《录鬼簿》作《武成庙诸葛论功》，不知是否三国故事）。

高文秀 《周瑜谒鲁肃》，《刘先主襄阳会》。

郑德辉 《王粲登楼》，《三战吕布》（二本）。

武汉臣 《三战吕布》（二本）（按《录鬼簿》，武作的是一部分，余为郑作）。

王仲文 《诸葛祭风》，《五丈原》。

于伯渊 《斩吕布》。

石君宝 《哭周瑜》。

赵文宝 《烧樊城糜竺收资》。

无名氏 《连环计》，《博望烧屯》，《隔江斗智》。

这十九种之中，现在只有《单刀会》、《博望烧屯》（日本京都文科大学影刻的元人杂剧三十种之二）、《连环计》、《隔江斗智》、《王粲登楼》（臧刻《元曲选》百种之一）五种存在。明朝宗室周宪王的《杂剧十段锦》之中，有《关云长义勇辞金》一种，现在也有传本（董康刻的）。

我们研究这几种现存的杂剧，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国故事大概与现行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相差不远。内中只有《王粲登楼》一本是捏造出来的情节；如说蔡邕做丞相，曹子建和他同朝为学士，王粲上万言策，得封天下兵马大元帅，都是极浅薄的捏造。其余的几本，虽有小节的不同，但大体上都与《三国演义》相差不多。我们从这些杂剧的名目和现存本上，可以推知元朝的三国故事至少有下列各部分：

（1）吕布故事：《虎牢关三战吕布》，《连环计》，《斩吕布》。

（2）诸葛亮故事：《卧龙岗》，《博望烧屯》，《烧樊城》，《襄阳会》，《祭风》，《隔江斗智》，《哭周瑜》，《五丈原》。

（3）周瑜故事：《谒鲁肃》，《隔江斗智》，《哭周瑜》。

（4）刘关张故事：《三战吕布》，及以上诸剧。

（5）关羽故事：《义勇辞金》，《单刀会》。

(6)曹植、管宁等小故事。

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物（见上引苏轼的话），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个足计多谋的军师，而关羽已成了一个神人（《义勇辞金》里称他为“关大王”；《单刀会》是元初的戏，题目已称《关大王单刀会》了）。

散文的《三国演义》自然是宋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宋时已有很好的短篇小说，如新发现的《京本通俗小说》（在《烟画东堂小品》中）便是很明白的例。但宋时有无这样长篇的历史话本，还不可知。旧说都以为《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一个杭州人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或说是名贯，字本中（《七修类稿》）；或说是名本，字贯中（《续文献通考》）。《水浒传》、《三国志》、《隋唐演义》、《平妖传》等书，相传都是他做的。大概他是当时的一个演义家，曾做了一些演义体的小说。明初的《三国演义》也许真是他做的。但那个本子和现行的《三国演义》不同。当明万历年间，《水浒传》的改本已风行了，但《三国演义》还是很浅劣的。胡应麟在《庄岳委谈》里说《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又说此书与《水浒》“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可见此书在明朝并不曾受文人的看重。

明朝末年有一个“李卓吾评本”的《三国演义》出现。此本现在也不易得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铃木豹轩教授藏的一部《英雄谱》，上栏是百十回本的《忠义水浒传》，下栏是这个本子的《三国演义》。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子和那明初传下来的本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本子仍旧是很幼稚的。后来清朝初年，有一个毛宗岗（序始），把这个本子大加删改，加上批评，就成了现在通行的《三国志演义》。毛宗岗假托一种“古本”，但我们称他做“毛本”。毛宗岗把明末的本子叫做“俗本”，但我们要称他做“明本”。

毛本有“凡例”十条，说明他删改明本之处。最重要的有几点：

(1)文字上的修正：“俗本（即明本，下同）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今悉依古本改正。”

(2)增入的故事：“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今悉依古本存之。”

(3)增入的文章：“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今悉依古本增入。”

(4)削去的故事：“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今皆削去。”

(5) 削去的诗词：“俗本每至‘后人₁有诗叹曰’，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编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实之。”“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锺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诗馆驿屋壁，皆伪作七言律体。……今悉依古本削去。”

(6) 辨正的故事：“俗本纪事多讹。如昭烈闻雷失箸，及马腾入京遇害，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皆与古本不合。又曹后骂曹丕，而俗本反书其党恶；孙夫人投江而死，而俗本但记其归吴。今悉依古本辨定。”

我们看了这些改动之处，便可以推想明本《三国演义》的大概情形了。

我们再总说一句：《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多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

这部书现行本（毛本）虽是最后的修正本，却仍旧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为什么《三国演义》不能有文学价值呢？这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此书中最精采、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三国的人才都会聚在这一块，“三分”的局面也定于这一个短时期，所以演义家尽力使用他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打破历史事实的束缚，故能把这个时期写的很热闹。我们看元人的《隔江斗智》与此书中三气周瑜的不同，便可以推想演义家运用想象力的自由。因为想象力不受历史的拘束，所以这一大段能见精采。但全书的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至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不敢尽量想象创造，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水浒传》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三国演义》大部分是演述与穿插，故无法能出奇出色。

第二，《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计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了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又想写刘备的仁义，然而他们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的刘备。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这固是时代的关系（参看《胡适文存》卷一，页五二——五三），但《三国演义》的作者究竟难逃“平凡”的批评。毛宗岗的凡例里说：

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评阅……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今俱削去。

这种见地便是“平凡”的铁证。至于文学的技术，更“平凡”了。我们试看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一大段：在作者的心里，这一段总算是极力抬高诸葛亮了，但我们读了，只觉得平凡浅薄，令人欲呕。后来写“三气周瑜”一大段，固然比元人的《隔江斗智》高的多了，但仍是浅薄的描写，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了一个妬忌阴险的小人，并且把诸葛亮也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这些例都是从《三国演义》的最精彩的部分里挑出来的，尚且是这样，其余的部分更不消说了。文学的技术最重剪裁。会剪裁的，只消极力描写一两件事，便能有声有色。《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因为不肯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

话虽如此，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廿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我们都曾有过的这样的要求，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与感谢！

十一，五，十六。在北京。

（注）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

《三国演义》序

钱玄同

(一)

《三国演义》本是一部通俗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小说。向来将彼归入小说的原故，是因为前人解释“小说”这个字的意义和现在很不相同。他们所谓小说，是指那用白话的文章作了给平民——他们所谓“小百姓”——看的书，或是平民自己的著作而言。《汉书·艺文志》谕小说，说彼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尧狂夫之议”，又引孔丘“小道君子弗为”的话。其中所录的书《伊尹说》和《师旷》之下，都注曰“其语浅薄”，这是用白话作的证据；《周考》下注曰“考周事也”，《青史子》下注曰“古史官记事也”，《虞初周说》下应劭注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通俗的历史。所以中国从前所谓小说，是指那没有典丽堂皇的气概，不能列入所谓“高文典册”之中的书。那么，自然要将《三国演义》归入小说之中了。

(二)

《三国演义》虽不是真正的小说，但彼却是用作小说的笔墨来作历史，因此，彼颇有文学的意味，和其他的通俗历史如《东周列国志》、《北史演义》、《隋唐演义》、《廿四史通俗演义》等书随手乱抄、全无组织的大不相同。彼是历史，当然要因袭正史；彼却又是演义，自然不免要将简单的事实增饰铺张，改变原来的面目，并且还有虚构的部分，但彼虽因袭正史，却不是随手乱抄的；彼在旧材的取舍上和叙述的详略上是很费了一番剪裁的工夫的。彼描写书中人物的个性，虽然比不上《水浒》、《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诸书，可也不曾将刘备和孙权、张飞和关羽……写成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口吻、同样的动作。请问为什么看《东周列国志》的人对于齐桓、晋文、管仲、子产、伍子骨这些人的事迹

并不觉得怎样的有趣味，而看《三国演义》的人的脑子里便深深的印着曹操、关羽、诸葛亮、司马懿这些人的性情、口吻、动作呢？这就是《三国演义》工于描写，有文学的意味的原故啊。

《三国演义》之历史和文学的价值，我以为和《国语》（即《国语》和《左传》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本来只是一部《国语》，刘歆把《国语》中抽出一大部分与《春秋》有关的事迹，又造了许多解释《春秋》的话，依年重编，名为《春秋左氏传》，康有为的《伪经考》说得很明白）最为相像。照旧时的见解说，《三国演义》是“君子弗为”的“小道”，《国语》（包《左传》）是“羽翼圣经”的“贤传”。这样的区分，当然是毫无道理的。我以为，《国语》是一部从周穆王到周元王五百余年间的历史演义。《国语》记战争，记大事，记名人的言论，都很有小说的意味，不用那呆板板的记账式，彼往往将干燥无味的事迹写得生动变化；《三国演义》叙事的方法，正和《国语》相同。《国语》中曾特意描写几个有名的人物如叔向、子产诸人；《三国演义》也特意描写曹操、关羽诸人。《国语》取材于“诸侯史记”等书，而将史迹放大，加入许多奇巧的情节和婉妙的词令；《三国演义》取材于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所引各书，也将史迹放大，加入许多奇巧的情节和婉妙的词令。《国语》的著者是战国时代的人，他虽然是记西周至春秋末年的事实，但常常露出战国时代人的口吻（郑樵和姚鼐考证得很明白）；《三国演义》的著者是明代人，他虽然是记三国时代的事实，但也常常流露出明代人的口吻。这是两书很相像的地方。

（三）

上面所说的话，我曾经对朋友们谈过。有人听了，便问我：你说《三国演义》是通俗的历史，又说彼对于事实是增饰铺张的，而且还有虚构的部分。但历史是应该讲究“考信”的，改变事实的历史，如何可以认为通俗的历史？莫非你以为在通俗教育的范围中讲历史，不必严格的讲究“考信”吗？

我说：你这话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说《三国演义》是通俗的历史，是指原书的性质而言，是说彼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被平民社会认为历史而言，不是说我们今后应该将彼作历史读。“通俗教育”这个名词，我以为在共和国家是不应该有的。共和国的教育，当然是一律平等，有什么通俗不通俗的分别！只有那班不懂道理的官僚绅士们，他们自己吃饱了肥鱼大肉，将剩下的骨头抛给一班饿着肚皮的苦人，还说：“我可怜你们这班没有福气吃好东西的小百姓，我现在特别加恩，将这骨头赏给你们

吃。”这就是现在所谓通俗教育!关于历史的教授,我主张对于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将史事严格的“考信”了,才讲给他们听,我极端反对只有老爷少爷们才配看“信而有征”的正史,小百姓们只合看“齐东野语”的神史的办法。

但要讲究“考信”则不但《三国演义》不能作为历史读,就是那向来所尊为“高文典册”的正经正史如《尚书》、《春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辑览》等书,也何尝就可以作为历史读。《三国演义》对于事实,固然是增饰铺张,而且还有虚构的部分,但那正经正史也是如此。不说别的,单说那所谓什么三皇、五帝、三代(至西周止)的事实,百分之中倒有九十分以上是后人虚构的,那“言不雅驯”的百家传说,前人已经对彼怀疑了,但是那被尊为“经”的《尚书》,如《金縢》一篇,就是满纸鬼话,其荒诞不经的程度,比《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那一段还要加增几倍。我们看崔述的《考信录》,便可知经传所记三代及其以前的史事,大都是由简单的一句话逐渐增饰铺张的,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所引各书,便可看出一件事实彼此记载的详略不同以致歧异,什九也是由于逐渐增饰铺张的。所以若说《三国演义》的事实不足信,而信正经正史的事实,其见解实等于不知道二五即是一十,半斤八两。

(四)

我以为《三国演义》在今后虽不能再作为历史读,但大可竟作为小说读。将曹操、刘备诸人看得和宋江、武松诸人一般。彼的文学的价值,虽比起《水浒》、《红楼梦》诸书来,未免差得还远,但在过去的中国白话文学书中,彼必可占“第二流”的位置。现在将彼表章出来,作为一种文学的读物,是很应该的。

我对于今后读《三国演义》的人,我希望他们读彼和读其他小说一样,专注意于人物的描写。至于那一千七百年以前的历史上,有姓曹的、姓刘的和姓孙的三个人,他们因为要抢坐一把独夫民贼坐的交椅,彼此都指挥他手下的狗头军师和小喽啰们互相撕打,谁便宜谁吃亏都是“鸡虫得失”的细事,犯不着我们来替他们担忧。要是今后再有替刘备、诸葛亮流眼泪,大骂曹操该千刀万剐,对于关羽还要“关公”、“关帝”、“关夫子”、“关老爷”的闹个不休的人,我却要对他说一句干脆的话:“您看《三国演义》看傻啦,以后可别看啦!”

(五)

《三国演义》虽是一部白话的文学书，但彼的白话是用白话和文言杂糅而成的：既用“之”“乎”“者”“也”等字，又用“了”“的”“这个”“那个”“那里”等字；有时用很隐晦的古文词类，有时用很浅显的白话词类；有时用不合白话的古文句法，有时用不合古文的白话句法。总之这部书的文体，是庞杂不纯的。这文体庞杂不纯，或者有人认为是彼的短处，但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我的意见是这样：

(1) 白话文学和古典文学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乎彼此所用词类和句法的不同，实因前者是自由自在的，后者是披枷带锁的。主张古典文学的人，以为必须摹拟前人文章的旧腔套；其实在前人作文章的时候，本是很自由的，并没有预定了这样一个腔套；可是古典文学者不但摹拟了这个人的旧腔套，而且还要造出什么“义法”、什么“格律”这些名目，如是如是，这般这般，鬼话说上一大串，作了镣铐锁住自己，还要去锁别人。主张白话文学的人，是要扭断镣铐，还我自由，不再干削小了脚去凑鞋子的笨事，不再装没有生病而哼哼唧唧的丑态，无论什么思想，什么语言，都可以用文章表示出来；他们对于词类和句法，不问古今，不问雅俗，都可以信手拈来，供我自由使用，绝不受丝毫的拘束。这种白话文学初产生的时候，彼的文体总是庞杂不纯的。《三国演义》以外，如唐代禅宗的语录，宋代柳永、辛弃疾诸人的白话词，陆游、杨万里诸人的白话诗，元代的戏曲，明代李贽、袁宏道诸人的白话诗文，现代梁启超、吴敬梓诸人的新体散文，胡适五年前作的白话诗词，都是用白话和文言杂糅而成的。这种文体成了气候之后，逐渐蜕变，逐渐改良，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纯粹的白话文学。站在纯粹的白话文学一方面看，自然觉得彼的白话太不纯了，太庞杂了。但我们应该知道，由古典文学变为白话文学，若经过这个庞杂的阶段，是不会一蹴而几于纯粹之路的。

(2) 白话这个名词，我们不要将彼看得太窄了。现在有些人拿起笔来作白话文章，常常要提心吊胆，觉得某句太像文言，某字不是白话中所常用的，总非将彼等避去不可；于是对于像文言的句子，必须逐字直译为白话，弄成一句“盘空生硬”的白话，对于白话中不常用的字，必须找一个常用的字来替代，弄得字义似是而非。殊不知词类和句法，古今虽有不同，但这是逐渐蜕变的。这种蜕变，完全是循自然的趋势：有些词类和句法的寿命很长，几乎没有什么古今的变迁；有些寿命很短，常常看见彼在那里蜕变。《荀子·正名篇》所谓“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最可以作为这种蜕变的说明。因为词类和句法是逐渐蜕变的，所以白话之中往往保留着许多古文中的词类和句法；大概古文中较合于语言之自然的句法，意义很显明的词类，有大部分都被白话所保留。既被白话所保留，则已经变为白话，决不必因其中有“之”“乎”“者”“也”这些字样，便相诫不敢用入白话文章之中。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对于“白话”这个名词，曾经定了三个意义，如下：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答钱玄同书》，见《胡适文存》卷一，页五四、五五）。

他这个“白话新解”，我极以为然。我主张凡明白易晓的文言，可以尽量输入于白话之中，使白话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于应用上可以大得便利。

我因为怀了这两个意见，所以对于《三国演义》的文体，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又以为我们现在作白话文章，有时也不妨略略采用这一类的文体，说到这里，还要郑重声明一句，我这话决不是劝大家用《三国演义》去代《古文观止》，尤其不是劝大家拿《三国演义》当作“古文活套法”用。请大家千万不可误会！

一九二二，五，二九，午后十一时，作于北高师。

重刊《三国演义》序

清溪居士

昔陈承祚有良史才，所撰魏蜀吴《三国志》，凡六十五篇，已入正史。范颙称其词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裴松之亦谓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而惜其失在于略，复上披旧闻，旁摭遗逸，凡志所不载，事宜存录者，毕取以为之注，而三国事迹略备。

演义之作，滥觞于元人，以供村老谈说故事，然悉本陈志裴注，绝不架空杜撰。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阅者参观正史，始知语皆有本，而不与一切小说等量而齐观矣。

咸丰三年孟夏勾吴清溪居士书。

校读后记

汪原放

我点读了几部小说，知道着手点读之先第一件要紧的事是要访得一部可靠的本子用来作底本。我这次点读《三国演义》的第一步就是做这件事。我搜得的本子——木板的、石印的、铅印的——很有几种。可惜没价值的多。除开用不着细说的、不值得说的几种，现在且把我这次用来点读和作底本的三种——列在下面：

(1)“咸丰本”。这一种是十六册的大字木板本。纸张很好，印也印得好。第一页有“癸丑仲夏常熟顾氏小石山房刊”字样。卷首比别本多一篇勾吴清溪居士的序。现在我已经把他印在本书的卷首。

(2)“英雄谱”。这一种是二十册的木板本。就是和胡适之先生的《水浒传后考》第四页所说的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合刻的。

(3)“商务本”。铅印的。不知道是何时印的。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本子作底本的。坊间通行的本子大概都和这个本子一样，校对却都不及这一本，所以我单用这一种来代表第三种本子。

这三种本子虽都是毛宗岗的评本，都是一百二十回本，卷首的金圣叹的序哪、凡例哪、《读法》哪，也都一样（只“咸丰本”多一篇清溪居士的序，“英雄谱”多一篇熊飞的序）。其实是两种本子：“咸丰本”和“英雄谱”是一个本子，“商务本”是一个本子。

我细细把这三种本子比较一番之后，觉得“咸丰本”和“英雄谱”最可靠了；又因为“咸丰本”的字大，纸好，错字比“英雄谱”少些，所以我这次决用“咸丰本”作底本。我很高兴我这次得着这个可靠的本子用来作底本。我现在且略举几个例来证明“咸丰本”（“英雄谱”和“咸丰本”是一样的，除开不说了）何以比较要算是可靠又好些的本子：

(1)第十三回第二页有一段是：

玄德曰：“陶使君新逝，无人管领徐州，因令备权摄州事。今幸将军至此，合当相让。”遂将牌印送与吕布。吕布却待要接，只见玄德背后关张二人，各有怒色。布乃佯笑曰：“……

双圈的字是“商务本”和其他的本子都没有的。这个地方要是没有这四个字，就有些不明了：究竟是在谁背后？是在吕布背后，还是在玄德背后？

(2)第十八回第四页有一段是：

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操军虽败，必有劲将为后殿，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车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皆胜也。”

双圈的字，“商务本”和各本都作“夫操于退兵者之急”。这一处实是“咸丰本”不错。别本的错，一定是一个本子错，个个本子——用这个错了的本来翻印的——也跟着一齐错了。

(3)第二十二回第一页有一段是：

却说陈登献计于玄德曰：“曹操所惧者袁绍。绍虎踞冀青幽并诸郡，带甲百万，文武官将极多，今何不为书遣人到彼求救？”玄德曰：“绍向与我未通往来，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间有一人与袁绍三世通家。若得其一书致绍，绍必来相助。”玄德问何人。绍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节敬礼者，何故忘之？”玄德猛省曰：“莫非郑康成先生乎？”登曰：“然也。”

双圈的字，“商务本”和其他各本也都没有。我觉得这两句句子是不可少的。

(4)第四十四回第七页有一段是：

少顷，周瑜入见。礼毕，孙权问慰罢。瑜曰：“近闻曹操引兵屯汉上，驰书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权即取檄文与周瑜看。瑜看毕，笑曰：“老贼以我江东无人，敢如此相侮耶！”

这一段里面假使没有“瑜看”两个字，实在读不下去。“商务本”和别本都没有。这种没主词的句子“咸丰本”虽也免不了，但比较少些。

(5)第六十九回第二页有一段是：

安平太守王基，知谿神卜，延谿至家。……谿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尸。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俱已朽烂。

双圈五个字各本都没有，显然是脱了。这五个字却是脱不得的。脱了，一来，神卜管辂卜的岂不是不对了？二来，也看不明白了。

看了我在上面举的几个例——有的是一两句话子不同得好，有的是一两个字面不同得好——大概可以承认“咸丰本”确是比较可靠的本子。但我用了这个本子作底本，要想免掉校读的手续，只做标点和分段的工夫，还是不可能。我现在也觉得校改古本的字实在是一件不妥当的事，但有许多明显的错——当然是当时刻板错了，校对错了——看出来不改正，心里总觉着不安，所以我这次定下一个例：凡是用别的本子参照起来校得正的显然的错字，一概把它校正。

我现在且单单举出第二十二回里“咸丰本”的一个非校正不可的地方来，那一段原文，先录于下：

原来郑康成名玄，好学多才，尝受业于马融，融每当讲学，必设绛帐，前聚生徒，后陈声妓，侍女环列左右。玄德听讲三年，目不邪视，融甚奇之。及学成而归，融叹曰：“得我学之秘者，惟郑玄一耳！”

这一段里，双圈的“德”字“商务本”和其他各本都没有。这一处“英雄谱”作“玄德讲三年”，显是“听”字错作“德”字，后人校注“听”字于“德”字之旁，而刻者误将两字一并刻入正文。此可见“英雄谱”本之在前，又可考见致误之由了。

在这一点看起来，全书的校读，确不是容易的事。这一部一百二十回的大书，从头校到尾，决不能单靠我一个人的精力。若没有我的朋友章希吕和余昌之两君的精力，这书决不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十一，五，十二。